

文学译介中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以日译期刊《灯火》模式为例

鲍 同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100872)

提 要: 中国文学对外译介活动由来已久,相关批评成果丰富多样。近年,学界以“译者主体性”为中心的讨论比较热烈,内容涉及译介动机、翻译策略、社会影响等方面。但是,很多研究默认译者为“个体”,强调母语的优势或劣势,忽略对译者群体、共同作业的考察,对在此过程中存在的译者间的共融性、互补性和创新性研究不足。日译期刊《灯火》通过尝试性译介实践,为相关工作提供新的思路,也为译者主体性研究提供例证。而这种由中方主导、中日双方共同协作的模式亦可复制至其他译介活动中,助力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

关键词: 译者主体性;文学译介;《灯火》;重译;副文本

中图分类号: H31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20)03-0088-4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20.03.014

A Study on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 Taking the Mode of *Tomoshihi* as an Example

Bao To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s a long-standing practice with various criticisms.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ve been heated discussions focusing on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n the academic field, including the translation motivation, translation strategy, and the social influence. However, translators are often seen as “individuals”. The advantages or disadvantages of mother tongue are emphasized; the studies on translators and cooperation are ignored, and there is a lack of the research on the amalgamation, complementarity, and innovation among translators during the process. The periodical on Japanese translation, *Tomoshihi*, provides new ideas for related fields and examples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by tentative practices of translation. The mode of China-Japan cooperation led by China can also be used in the translation to propel the spread of Chinese literature overseas.

Key words: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literary translation; *Tomoshihi*; retranslation; paratext

1 译者主体性的研究现状

近年,有关译者主体性的批评活动逐渐增多,研究方法多样,学术成果颇丰。学者总结译介动机、分析翻译策略、估测社会影响,展现译者工作的社会价值。然而,在此过程中一些“学术边界”问题尚未完全厘清,甚至存在较大争议,影响问题

意识、论证方法和阶段性结论,也影响有关译者责任、译介模式、作业标准等方面的讨论。

首先,对“译者”的理解学界尚未完全统一。由于在公开出版的译作中,译者多以“个体”形式署名,致使一些学者将“译者”默认为译作创作的唯一责任者,将研究重点过于集中在如葛浩文、顾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五四’新文学运动后中国文学在日本的译介研究(1919-2018)”(17BWW03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电子邮箱: baotong@ruc.edu.cn

斌、藤井省三等等个体译者身上,而对译介活动的共同作业重视不足,也忽略译介团队、编辑团队的社会作用。这便导致两个情况的出现。其一,研究者倾向于研究自己熟悉的译者,视野局限于个案,仅通过局部、片段观察推测整体译介活动,所得结论有以偏概全之嫌。其二,一些译介讨论以译作发行数量或发行范围为依据,将“汉译英”等同于外译的全部活动,形成外译主体研究的预先排他性,导致非通用语种的研究明显不足。通过统计翻译学、外国语言文学等主要期刊所刊载的对外译介类文章不难发现,《中国翻译》近十年共刊载“外译”实践、理论研究文章约200篇,绝大多数为“汉=英”研究,涉及对德国、法国、日本、坦桑尼亚等国译介活动的文章仅十余篇;而《中国外语》更倾向“一事一议”的文学翻译实践研究,在约五十篇的“外译”研究中,多为对《红楼梦》《论语》等文学经典的英译研究,以及如葛浩文等译者的个案研究,俄语、拉丁语等非通用语种研究凤毛麟角,说明对译者的模式化、国别化研究十分不平衡。

其次,很多学者过度强调译者的母语优势,依此将译介活动总结为中国本土译者模式、汉学家译者模式和中西合璧模式(张丹丹 2015: 152),却忽略译介对象,即原作本身的“特殊属性”对遴选译者的影响。在对外译介的活动中,党政文献、文学作品、文化资料分属不同译者群体完成,如两会文稿、政府公告、法律法规、契约条款等文字必须尽量避免被误读,只有在有关部门强有力的领导和严格的监管下才能保证译介活动的规范性、即时性、连续性。从这些活动的实践经验来看,对初译稿译者的考察更强调意识形态、思想高度和认知水平,以保证译作信息的完整性和精确性,在这种情况下,“母语方向原则”并非是遴选译者的优先条件。

再者,译介主体性的研究过于集中在理论层面,实践研究相对不足。特别是很多研究以西方译介理论为依据,着重分析“异化、归化”“等值理论”“接受主义”等概念,认为这些理论可以指导一切外译工作,呈现“凡理论必言欧美”等倾向,忽略对中国国情、译者现状、受众情况等方面的考量,也对近些年中国学者提出的“译者行为批评”“党政文献外宣理论”“译文学”等概念、理论缺乏足够重视,导致中国学者、译者、读者对他国学术理论产生习惯性仰视心理,缺乏学术研究的主体性或主动性。译介活动的关键在于实践,学术理论虽可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但在现阶段需加速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学术研讨应以“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为原则,重视实践分析,避免空中楼阁似的“解释说明解释”“概念衍生概念”“理论推导理论”等情况发生。

由此可见,译者主体性研究要注意研究对象的精准性、实践活动的先行性和一国一策的特殊性,以避免静态研究的滞后性,完成译介活动的多重解构。而作为文学作品的再创作者,译者处于译介活动核心位置,通常会介入译介活动的全过程。将译者行为进行系统梳理,能够有力支撑译者主体性的实证研究和创新研究,保证实践研究持续、纵深发展。

日本译介中国文学的历史由来已久,译介内容紧跟中国文学的动向,译作类型众多,包括诗词、小说、散文、戏剧、纪实文学、回忆录、漫画等,成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有效载体。与此相关的译介批评从未间断,内容几乎涵盖译介的全部要素。特别是对实践活动的实时追踪,为相关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译者主体性研究提供有力例证。

2 创新工作模式

20世纪之前,中国文学对日译介活动从策划、翻译到编辑、出版,再到宣传、调研,这一系列活动基本由日方主导完成。因此出现如下现象:首先,日本译者与中方原作者、译者、学者的交流比较有限,一般仅涉及斟酌个别词语、确认作品信息、协调发行宣传等方面,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译介协作。即便译介团队引入中国学者,基本以常年旅日人员或华裔为主,鲜有生活、工作于中国本土的人员。其次,日方在遴选原文、后期编辑时更重视发行数量,以及由译作引发的话题性讨论。因此,译介对象更倾向于获奖作家或被日本读者熟悉的作家作品,导致一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和学术价值被忽略,优秀新人新作在成名之前较难进入日本译者、读者的视野。再者,日本译者大多为兼职人员,出版发行方也非以译介文学作品为第一要务的出版社,导致原作与译作的发行时间相差较大,存在一定滞后性。

面对这些现象,中日双方人员曾通过译介编辑合集、集刊、期刊等方式进行尝试,寻求合作途径,并形成由两国学者共同编辑的日本文学翻译期刊——《灯火》。该刊于2015年11月创刊,刊名表达“照亮中日文学交流之路”之意,目前已出版两期。与此前译作期刊不同,创刊伊始《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便兼任主编,饭冢容为日方译

者第一责任人,顾问、日文审定、日文执行编辑均为中方,形成了“日本译者作业+中国编辑发行”的新型模式,以此探索中日协作日译中国文学的合理方式。译者主体性和编辑主体性的相互作用,才可维持的是翻译活动和编辑活动的生态平衡(周领顺 周怡珂 2018: 110)。中方负责编辑工作,并确立“《灯火》最终编译权属于《人民文学》期刊社”的工作原则,使中方能够掌握相关译介活动的主动权,并将原作的遴选框定在《人民文学》《小说月报》《作家》等中国文学期刊刊载的作品之上,避免日本译者原作遴选的过度主观性。

在共同作业过程中,中日双方取长补短、互通有无,逐渐改变日本译者固有的“单兵作战”的工作模式,使他们意识到团队协作的重要性,推动译介活动朝规模化、系统化、专业化发展,保证译文的方向性和准确性,避免日本译者因个人好恶、或受“物哀”等传统意识影响而“过度解读”中国文学。不仅如此,译介对象集中在中国文学“权威”期刊,使日本受众更容易看到中国文学的发展路径,辨清潮流趋势,感受时代脉搏,接受新鲜事物,促进日本民众对当代中国文学的进一步了解。除戴来、蒋一谈、苏童外,《灯火》中不乏首次被译介的作家作品,使日本受众的视野不拘泥于某一作家、类型、时期,而是通过中方定向推荐,关注到富有正能量的群体现象、社会思潮。

另一方面,将编辑出版等工作置于中国进行,既便于双方参与译作从草稿到定稿的全过程,也可保证期刊发刊的持续性、稳定性和规范性,有效减轻单方工作压力。加之《灯火》的期刊性质定位为《人民文学》日文版,它与已发行的《人民文学》英、德、俄版外刊形成“合力”,产生规模效应,成熟的对外发行渠道使日本译者无需分担市场压力,有效节省译介团队精力,提升工作效率,为日本译者的“译介反思”创造条件。

3 提供反思平台

译者通常会在译介过程中及译作成形后产生反思行为,这既是人之本能,更是职业需要。而在出版之后,少有出版单位为译者提供平台,对译作进行反思。目前,译介实践的“大数据”尚未完全形成,鲜有学者通过比较不同译者的多个译本,搜集读者反馈信息,并通过信息整理、分析对译者能力、译介效果进行科学判定。加之一些中国文学作品在初次译介时并未引起日本足够重视,因而译者很难获得来自同行、读者充分的回馈信息,译介反思更加难以进行。

《灯火》则以文学重译的方式促进这种反思的展开,为译介活动的尽善尽美创造条件,更为中日高校教学活动提供教学、实践的素材。《灯火(2016 特别版)》共收录7位作家的7篇小说和1篇散文,其中4篇为重译,即《西瓜船》(苏童)、《明月寺》(叶弥)、《乡村电影》(艾伟)和《灵魂课》(朱山坡)。在重译过程中,译者尽量尊重原作的叙事节奏,保证文脉流畅。其中,《西瓜船》译文约3万字,译者修改千余处,除长句外,还在词汇、句式等方面做出调整,注意名词、副词、助词、接续词的使用,使译文更加贴近原文。对描写中国农村场景的内容,译者以夹注方式重新解释相关词语,如“烏篷船(ウーポンチュワン 薄い竹片で編まれた苫のついた小型の木造船)”“八斤三両(一斤は五〇〇グラム、一両はその十分の一)”“三角(一角は一元の十分の一)”等。此外,译者倾向改用ABAB型的副词修饰动词,使译文更加简洁、生动,如“慢慢地钻出来(のそのそと這い出してくる)”“一件件地拖出来(次々と引っぱり出して)”“还在滴水(まだぼたぼたと滴が落ちていた)”等。再者,译者对四字词汇的译文做出相应修改,如“欲擒故纵(こんな搦め手から攻めてくる)”“似懂非懂(きちんと理解できなかったようにも見えた)”“三言两语(二言三言)”等,反映出译者敢于自我否定的工作态度,也说明充足时间、多次试译对译介工作精细化的重要性。

值得一提的是,在4篇重译中不止一处出现“調和がとれる”一语。此短语曾因我国提出的“和谐社会”的日语译文“調和のとれた社会”及其周边词汇译文而被日本逐渐理解接受,现在日本媒体描述中国相关事物时也参照使用。另外,“調査なくして発言権なし”即“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雷鋒に学ぶ(殉職した解放軍兵士に学ぶ政治運動)”即“学雷锋”等词句出现在重译译文中,体现我国党政文献对外宣传的国际影响。但是,夹注部分内容属于译者的个人解释,对语义的考察不甚全面,说明日本译者对准确理解原文仍存在一些困难,进一步体现出中国译者、学者、编者帮助日本译者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通过重译,译者能够发现此前译作的不足,积极进行自我剖析、自我“否定”、自我修正。在多次研读原文、研磨译文后,译者对中国文学活动的理解会更加深入,促使持续关注中国文坛,成为此后译介工作的动力来源。不仅如此,重译工作还可激发新人译者的勇气,成为他们参与译介工作、

融入译者团队的“捷径”,为大规模、大体量的中国文学对日译介活动补充新鲜血液、储备译者资源并为最终形成“中国文学外译人才库”提供帮助。

4 增加“介绍”内容

文学译介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交流,其前提是承认文化差异的存在及由此带来的沟通障碍。但是,很多译介活动忽略译者与受众之间存在的认知差异,预先认定受众的知识储备、理解能力等同于译者,仅专注于译作正文的文字转化工作,重视“译”而忽视“介”,使译作接受阶段并不顺畅,无法有效帮助读者充分感受异国之美。在编译《灯火》期间,译者、编者均注意到这一点。目前,《灯火》译者团队共 18 人,大多来自早稻田大学、东京都立大学、神户大学等日本高校。从学历背景来看,12 名译者的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文化社会和语言学专业各有 3 名。他们充分利用《灯火》的媒介作用,将“副文本”作为载体,调整“译-介”比例,适当增加名家名作、新人新作的介绍性内容。

“副文本”的学理概念源于欧洲,一般指“在正文本和读者之间起着协调作用的、用于展示作品的一切言语和非言语的材料”(肖丽 2011: 17)。于译作而言,序跋和注释部分较受关注。在每篇译作之前,《灯火》的译者均附译作序(说明)。在此过程中,译者十分注意学术规范,尽量通过“第三方视角”将焦点集中于作家作品本身,回避此前为获得社会关注而使用的具有感官刺激性的词汇,如“离婚”“伤痕”“家暴”等,也较少使用“悲情”“颓废”“丑陋”等词汇进行印象性文学描述,以此理性引导读者。

同时,译者还结合自身专业知识,通过比较等方法,从社会学等角度对作品进行解读,在介绍背景知识的同时更体现译作的“学术服务”功能。如《在酒楼上》(蒋一谈)的译者序逾千字,内容包括作者的出生年月、学历背景、所任职务、已刊作品、获奖情况等,同时,译者小笠原淳保留中国文化的原汁原味,以“汉字移植+注释”的方式翻译专有名词,如“酒楼(料理屋)”“北漂(ベイピアオ)”等,例举作品信息,如“伊斯特伍德的雕像(イーストウッドの彫像)”“中国故事(中国のお話)”等,介绍文坛现象,如“蒲松龄短編小説賞”“『小説選刊』短編小説賞”等,既保证日本读者的

阅读理解,也避免因查找对译词而过多消耗译者精力,还为中国文学建立日译语料库、数据库和编纂工具书等工作积累素材,为学界的研究提供方便,体现出译者主体性和主动性。

5 结束语

本文以日译期刊《灯火》为例,探讨中国文学对日译介活动中的译者主体性。在该刊“编辑后记”中,饭冢容认为目前的工作尚处于试错阶段,中日译者仍在继续摸索更为理想的译介模式,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目前,中国文学期刊种类繁多,刊载作品能够即时反映社会百态,表达民众意愿,体现文化自信,是外国关注中国的重要窗口,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有效途径。《灯火》的译介活动能够帮助从事对外译介的工作者、学者不断进行实践创新,通过对载体模式、译介内容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增加工作灵活性,发挥译者群体优势,推动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

参考文献

- 施戡军. 灯火(2015) [C]. 北京: 外文出版有限公司, 2015. || Shi, Z. -J. (Ed.), *Tomoshihi: 2015* [C].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2015
- 施戡军. 灯火(2016 特别版) [C]. 北京: 外文出版有限公司, 2016. || Shi, Z. -J. (Ed.), *Tomoshihi: Special Edition 2016* [C].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2016
- 肖 丽. 副文本之于翻译研究的意义 [J]. 上海翻译, 2011(4). || Xiao, L. The Significance of Paratext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J]. *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ion*, 2011(4).
- 张丹丹. 中国文学借谁“走出去”——有关译介传播的 6 个思考 [J]. 外语学刊, 2015(2). || Zhang, D. -D. What Means Can Chinese Literature Resort to for “Going out”—Six Reflections on Chinese Medio-translatology [J].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2015(2).
- 周领顺 周怡珂. 西方编辑之于译作形成的影响性——美国翻译家葛浩文西方编辑观述评 [J]. 外语学刊, 2018(1). || Zhou, L. -S., Zhou, Y. -K. The Editors' Influence on Translation in the West: A Review of Goldblatt's Views on Editing [J].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2018(1).